



公益慈善 代表委员关注这些事



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

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郭帅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全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急剧上升。“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既是为老年人解当下之急、燃眉之急，又是为其家庭成员解决后顾之忧，更是为全社会提供稳定预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社会服务。”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言，要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广大老年人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依托。”唐承沛表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是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

在他看来，社区是连接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桥梁纽带。“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是养老服务的三种基本形态。”唐承沛认为，社区养老汇聚了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医疗卫生、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紧急救援等各类服务资源，既可以通过发展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养老机构合作等方式，将机构养老服务引入到社区；又可以通过开展上门服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等方式，将专业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庭，便于老年人根据自身情况，就近就便享受养老服务。

“所以社区是一手托两家，自己也当家。”唐承沛说。与此同时，社区是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有机结合的有效载体。社区具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鲜明特性，契合老年人习惯在熟人社会进行人际交往的特点，有利于老年人主动参与邻里结对、“时间银行”、养老互助社、养老大院等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和志愿服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更好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本区本院、相亲相熟、就近就便、可走可留的特点。

据介绍，近年来，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着眼于满足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需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养老服务资源布局、探索创新多样化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不断提升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取得长足进步。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既能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又能减轻家庭成员赡养老人负担，还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是需求大、花钱少、见效快的养老服务方式，需要大力发展。”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在前期探索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针对老年人居住在社区的特点，进一步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指导各地根据人口分布、老龄化水平、发展趋势及资源布局，在区县层面打造一批层次清晰、机构衔接、功能互补、区域联动的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实现辖区内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全覆盖，构建“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养老服务聚集在老年人身边、家边、周边，提高服务精准性、便捷性、可及性。”唐承沛说。

二是针对资源聚集在社区的特点，进一步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形式。在社区层面重点发展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健

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大力发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医、助急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鼓励引导连锁化经营、标准化管理的养老服务机构，依托社区向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专业服务，为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参与社会提供支持。

三是针对社区贴近老年人需求的特点，进一步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针对老年人看病难问题，指导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通过签约合作、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毗邻建设、内设医疗康复站点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双重需求。针对养老照护难问题，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技术赋能，推动养老照护产品和老年用品生产研发、创新升级，有效减轻家庭照护者劳动强度，提升居家老年人生活质量。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等，对老年人开展公益智能应用等技术培训，助力老年人了解新事物、应用新技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张学军：

配置“AED”为生命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高新国

一学生心脏骤停，现场多位同学利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校园捐赠配置的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及时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成功施救。这是2022年10月发生在北京一高校球场上的事情。类似情况，时常在学校、体育馆、公共场合发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副市长张学军表示，在校园特别是体育场馆附近配置AED，对学生因剧烈运动、情绪剧烈起伏等原因造成危险时进行及时救援十分必要。

2021年12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属于熟人圈，具有一定亲情度，特别是学校和授课教师具有一定主体责任，在危急时刻会积极施救，相对于一般公共场所，在校园配置AED更具可行性。”张学军说，学校运动场是心脏性猝死相对高发区域，AED作为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对校园运动场所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具有重要

意义。“应充分考虑操场、体育馆等多发、易发学生猝死险情的区域实际，结合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4分钟要求，考虑AED的作用半径，科学合理布局AED位置。”张学军建议，有效整合红十字会、卫健部门资源，指导各地加大投入，积极推进AED设备在校园的推广普及，提高AED设备安装率，确保险情发生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近找到AED设备，提高AED急救效应。

着眼于提升AED使用能力，张学军建议，对高中及以上在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进行AED设备操作专项培训，尤其是对体育教师做好使用培训。“通过组织参加红十字会急救培训、医疗机构心肺复苏讲座、校园急救应急演练等，使其进一步熟悉和使用AED参与急救，为学生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张学军表示，同时要抓好宣传和引导，营造校园师生知道、会用更敢用校园AED救助病患的良好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刘启芳：

推动落实慈善事业激励政策

本报记者 郭帅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资源进入公益慈善事业，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在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的同时，也对公益慈善组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刘启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行慈善法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发挥慈善功能作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刘启芳认为，目前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监管制度机制尚不完善，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慈善组织专业人才缺乏，公信力建设较为滞后；一些慈善创新形式缺乏有效规范，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就此刘启芳建议，要加大力度营

造行善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慈善文化，提倡向上向善，使人人慈善和法制慈善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善行者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此外要积极推动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激励政策落实。”刘启芳表示，要从税收减免、社会组织服务准入、公益慈善组织管理、公益慈善奖励制度等方面推出更切实可行的激励性政策制度，为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公益慈善提供更多路径选择和权益保障，完善人人皆可慈善的动力机制，激发并呵护更多企业和社会群体参与公益的意愿和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

刘启芳还表示，有关部门应加强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管理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监督管理；畅通社会公共监督渠道，推广运用“互联网+”，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慈善管理中的运用，引导公众参与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监督，提升监管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全国政协委员何明华：

壮大临终关怀志愿服务队伍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高龄、失能、重病……慢性病、恶性病等困扰着一些走到生命尽头的老年人。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何明华围绕老龄化、高龄化趋势问题，提出全面加强安宁疗护志愿服务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

“安宁疗护，即临终关怀，是指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预防并发症等姑息治疗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为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排解心理和精神问题，帮助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何明华介绍说。

他表示，我国临终关怀事业起步较晚，服务团队以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为主，存在受群众接受程度不高、专业能力普遍较低、从业者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志愿者激励措施较少等因素制约等问题。

如何进一步做好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工作？何明华认为，首先应深入开展生命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依托行业协会、媒体、教育系统等各类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广泛推广生命教育课程，普及生命教育；充分利用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安宁疗

护相关知识，增强社会的接纳度，为开展相关志愿服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要大力扶持安宁疗护志愿者专业培训，加快提升志愿者队伍数量和质量。”何明华建议，各级政府投入专门财政资金，委托群团组织或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医院、社工机构等探索建立志愿者教育培训机制，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定期组织不同区域的志愿团队进行交流研讨，邀请优秀骨干志愿者交流心得体会，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和智慧，不断提升志愿服务能力，努力为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安宁疗护服务。

对于如何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何明华表示，应完善保障激励机制，“各级政府和安宁疗护机构主管机构应出相应的资金保障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志愿者表彰激励。此外，通过提供免费体检、购买意外保险等方式，为志愿者提供良好保障，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归属感，增强志愿团队的凝聚力、吸引力，不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

积极推进慈善医疗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医疗救助与慈善事业的衔接与发展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社会公益力量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援助，帮助他们解决看病就医负担，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向医疗领域的慈善资源呈现逐渐增加之势，汇聚公众爱心善意的筹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帮助的困难群众数以百万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重大疾病是城乡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在法定医疗保障制度还不能全面解除疾病治疗后顾之忧的情形下，慈善医疗作为利用社会力量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医疗费用的有益补充，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民间力量。

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实践中，慈善医疗近10年来发展迅速。据统计，在全国慈善领域，每年约有30%的慈善资源用于帮助困难患者和医疗卫生事业，慈善医疗的规模仅次于教育领域。

“如果将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等在内的所有涉及医疗卫生方面的项目纳入，慈善医疗的实际数额可能反超教育而成为慈善事业的第一大项。”在调研中郑功成发现，从慈善医疗去向来看，主要有药品援助、大病患者救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及体系建设、疾病预防与筛查，以及慈善医疗资源流向公益服务、医务社工、科研资助、大众

宣传、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项目。尽管慈善医疗救助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法律政策支撑缺乏、救助不够精准、信息整合不足、救助组织缺乏有效联动以及公信力不强等问题。

为促进慈善医疗健康发展，郑功成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对慈善医疗的认知程度与重视程度，充分认识慈善医疗在目前我国慈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并将网络个人大病救助纳入中国特色慈善医疗范畴，通过促进慈善医疗的健康发展来带动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明确网络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的法律地位、监管主体及一般行为规范，为这项公益事业提供基本规范。同时，各地医保部门可与民政部门共同牵头，联动相关部门、慈善组织和医疗机构，形成联动机制，统筹推进慈善医疗发展。

此外，郑功成呼吁，在安全合规的条件下，由各地医保机构、救助机构主动发现和应当救助的人群，开辟慈善医疗机构对申请者的信息与救助或医保机构的验证渠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慈善医疗资源供需有效匹配。

“我们要高度重视慈善医疗对于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建设的有益补充作用，真正将慈善医疗视为一个层次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以便其更好地发挥帮助困难患者的作用。”郑功成说。

全国政协委员林敏：

加快乡村公益医疗互助发展

本报记者 孙金城

《“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指出，要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如今，乡村公益医疗互助已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等15省、市215个县区开展，参与群众达到753.7万人。在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医疗副主任林敏看来，乡村公益医疗互助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林敏专门对乡村公益医疗互助发展进行了调研，并在全国两会提交了相关提案。

“乡村公益医疗互助是农村基层公益互助活动。”林敏说，乡村公益医疗互助中，以群众互助出资为主，社会、村集体、政府量力而行资助，筹集的互助资金全部放在乡镇账上规范管理，全部用于按病种公平补助给住院群众，“重点补助大病，小病也有补助，由成熟的第三方平台提供科学简便的专业服务。”

通过调研，林敏看到，目前乡村医疗互助新保障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政策和工作体系。

林敏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纳入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明确乡村公益医疗互助的定位和工作目标。”另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可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提炼总结乡村公益医疗互助经验，制定加快乡村公益医疗互助发展的工作方案，统筹管理并全面推广乡村公益医疗互助。”

这一年，林敏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级扩面。林敏说，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一种为被保险人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年老患病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失能人口照护需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林敏认为，应尽快总结试点地区经验，找出最具普适性的全国统一的参保标准和失能评估标准，“各省市也应在执行全国统一参保标准和失能评估标准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设置个性化的护理服务项目，在统一标准的同时，又能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丰富的照护服务。”林敏说。

全国政协委员龙墨：

落实慈善资产投资收益税收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顾磊

“慈善资产是慈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做强做大慈善资产对于慈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有关慈善资产投资收益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直难以落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龙墨告诉记者，慈善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慈善组织及其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然而，按财税相关政策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收入是免税的，而投资收益（除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之外）却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投资取得的收益也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龙墨认为，对于一家慈善组织而言，捐赠收入与投资收入有很多共同点，如管理主体相同，均为慈善组织；资金用途相同，均要求全部用于慈善目的；管理规范相同，均须遵守慈善法、民政部门规章及本组织章程之相关规定。

对慈善资产投资收益课以企业所得税，使得国内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微利化态势明显。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19日，我国有9250家基金会，注册资金200万元到1000万元的微型和小型基金会近7000家，占比76%。根据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的统计，2017年-2020年，我国基金会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不到1.3%，调整后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不到1%。

慈善组织选择在银行吃利息可以不纳税，但近年来银行存款的收益率稳中有降。如果慈善组织想多一点流动性、多一点可能的收益而选择其他金融产品，就需要面临纳税问题。据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统计，2020年，我国基金会投资收益总额为69亿元。若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率全额缴纳，其税收总额也仅有17亿元。

龙墨认为，慈善资产是个人或组织在国家免税政策鼓励下自愿捐赠形成的资产，慈善资产的投资收益及本金只能用于公益，让这些资产做大，对增强慈善组织的“造血功能”，鼓励社会慈善资产的积累，助力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影响重大。

就此她建议，在慈善法修订中，做出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对慈善资产的投资收益给予免税优惠政策。“一旦我国慈善资产投资收益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将极大激发设立本土家族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热情。”龙墨认为，继养老金、企业年金获得上市后，慈善基金也可成为资本市场的一支新兴力量，撬动数倍于投资的市场（企业）规模，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国家税基，都是非常利好的。